

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

徐 坚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广东 广州市 510275)

关键词: 宾福德 过程主义考古学 新考古学

KEY WORDS: Lewis Binford Processual Archaeology New Archaeology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Lewis Binford's (1931 - 2011) academic career, the present paper emphasizes that New Archaeology, founded by Binford, is the intellectual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over the past century, rather than a sudden 'revolution' launched by some young scholars in the 1960s. New Archaeology is the first school with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e model-building process exactly represents the scientific feature of New Archaeology,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and unpromising one. Additionally, Binford had established new paradigms in both the study of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 and Ethno-archaeology. Although his influenc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re still limited due to paradigmatic conflicts, it is undeniable that Binford's achievements are parts of irreplaceable heritages in World Archaeology.

2011 年 4 月 11 日, 路易斯·宾福德 (Lewis Binford, 1931 - 2011) 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 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 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 “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早在 1999 年底, 《科学美国人》杂志就称, 宾福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

宾福德的学术生涯几近半个世纪, 明年就是宾福德发表新考古学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正是考古学史上告别分类—历史阶段, 步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 宾福德不仅开启了新考古学潮流, 而且一直站在考古学研究的最前沿。无论是早期对以基德 (Alfred Kidder) 的中西部修正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鞭笞, 还是晚期与霍德 (Ian Hodder) 就考古学中的象征主义的交锋, 还是与同属新考古学的施斐尔 (Michael Schiffer) 的行为考古学在中程理论上的论争, 宾福德都有重要的论文。虽然宾福德为考古学提供了第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 但是绝不可低估他在众多具体个案上的卓越研究。无论是采集—狩猎社会还

是马斯特林期石器, 宾福德在事实性资料的搜罗和处理上丝毫不亚于 20 世纪初期最好的文化—历史学派考古学家们。宾福德于 1931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 深受文化人类学大师怀特 (Leslie White) 的影响投身于考古学研究, 并于 1964 年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宾福德先后短暂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和洛杉矶分校, 最终在新墨西哥大学和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 直到 2003 年退休。2001 年, 宾福德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 年, 国际天文协会命名第 213629 号小行星为“宾福德星”, 以表彰他为全球考古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改变。

“新考古学”或者“过程主义考古学”被当成宾福德的代名词, 但是宾福德的学术成就更多元, 又更系统。宾福德是当代著述最丰的考古学家之一,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共计出版专著 18 种, 发表论文约 130 篇。其中, 被频繁引用的著述大约十余种, 绝大多数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必读文献。从这个极简书目上看, 宾福德的贡献至少存在于几个密切相关的领域: 首先, 作为新考古学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宾福德确定了这场考古学革命的基调。1962 年, 宾福德发表名作《作

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提出考古学应该成为有助于理解文化异同的人类学的一支,考古学的根本任务是“明晰和阐释人类存在的全部时间和空间范畴内体质和文化异同”^[1]。宾福德明确反对将考古学遗物视为无区别的、可以任意比较的“特征”,遗物的形态变化常常归因于不同的“历史传统”的“混合”、“直接影响”或者“刺激”。作为替代方案,他提出了“系统方法”,即将考古学文化视为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多个“亚系统”的总和。1965年,宾福德发表《考古学系统观念和文化过程研究》,进一步明晰新考古学的要义,也为新考古学与文化-历史考古学划清界限提供了关键要素,即对文化过程的研究。这篇论文首次明确提出在考古学文化中分离不同向度的“亚系统(subsystem)”,确认不同的文化变化动因、速率和模式,因而被视为过程主义考古学的正名之作。新考古学因此也被称为过程主义考古学。与之生气相通的年青考古学家们于1966年的美国考古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构成了1968年《考古学新视野》的基本框架,该书也是宣告新考古学派集体登场的作品。宾福德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考古学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复原文化史、复原生活方式和描述文化过程,而传统考古学在第三个目标上是失败,甚至毫无意识的。“新考古学”在解决这个新的问题上采用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即基于观察的假设、通则化总结和检验过程^[2]。宾福德的第二个学术研究和写作重点是采集-狩猎社会。除了1981年出版的《骨骼:古人和现代传说》2001年出版的《构建参考框架》尤其值得关注。该书是宾福德毕生对采集-狩猎社会研究的总结。在跨越阿拉斯加、澳大利亚和非洲的近20年的民族志调查田野的基础之上,宾福德建立了繁琐的两条主轴,一是他在世界各地的民族考古学调查材料和多达上千个采集-狩猎社会的故事,而另一条主轴是环境。宾福德在两条轴线之间不断尝试,寻找关联。其结论表现为11个问题,86个命题和126个通则。这是目前对采集-狩猎社会最详尽的研究的著述。宾福德试图以此回应“科学”考古学是否可行这个一般意义问题,不少学人将其称为“采集-狩猎圣经”。最后一个研究和写作领域是民族考古学。对宾福德而言,

民族考古学既是用来说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类比(analogy)概念,又是构建对采集-狩猎社会理解的基本个案。但是,宾福德改变了民族考古学的学术可信度,将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的殖民主义式民族考古学转变成构建中程理论的新考古学风格民族考古学。1978年出版的《纽纳特民族考古学》就是重建民族考古学的力作。

在考古学史上,新考古学的学术地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但是,由于新考古学方兴未艾,大部分评论者由于身处这个时代而无法客观观察,不同立场的考古学派都以新考古学作为对话对象,不同国家的区域传统和考古学范式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对新考古学的低估或者歪曲。此前曾有批评认为,新考古学是二战之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新崛起的年轻一代考古学家刻意的标新立异,但是,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威利和萨波罗夫的考古学史范式理论将宾福德揭橥的新考古学视为第四个时期——阐释时代的起始,彰显了范式转型的革命性意义。新考古学家也为了和既往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撇清关系,可能过度强调了自身之“新”。但是,新考古学的出现是长期发展和积累的最终迸发。在宾福德之前,新考古学思想早已露出苗头。崔格尔曾明确地指出,宾福德的新考古学是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功能主义和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自然延续^[3]。宾福德掷地有声的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也可视为威利和菲利普斯的论断——“美洲考古学就是人类学,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的深化^[4]。其次,新考古学是考古学史上第一个拥有独立的考古学理论的学术传统。新考古学以文化过程研究为核心,关注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如何不断适应变化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按照新考古学观点,“物质文化”代表了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文化系统的变迁应该在社会和环境等适应性情境中观察,而不能异想天开地看成不同群体“影响”、“刺激”甚或“移民”的结果。因为将考古学定位为人类学的分支,出于加深对历史上的人类和社会的通则性理解的初衷,新考古学构建了一批专属于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与此前的古物学风格的考古学具有天壤之别。第三,此前基于意识形态化的学科伦理认知,将新考古学提出的基于观察

的综合、假设和验证假设的作业程式批判为唯心主义方式,可能是对新考古学的误表甚至曲解。事实上,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建模(model-building)过程,相对于此前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中,任何物质材料以不言自明的方式“说明”历史问题而言,这是个显著的进步。以建模和检验模式的方式构建中程理论正是新考古学宣称其科学性的根本原因。新考古学对科学的强调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而自然科学测年方法、分析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的运用反而是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

相对于宾福德对采集-狩猎社会的研究所获得的盛誉而言,他在民族考古学上的地位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民族考古学”是早于新考古学就已经使用的词汇。自费克斯的《图萨扬人的迁移传统》率先使用“民族考古学家”一词以来,民族考古学成为常见的考古学类比方式。但是,无论是与历史特定主义相关的“直接历史法”还是与单线式进化主义相关的“一般类比法”,民族志类比方法以解决具体器物的名称、功能和意义为诉求,在新考古学之前基本已经丧失了学术可信度。在摆脱了古物学风格的考古学视野中,脱离特定的“系统”或者“情境”的孤立物质的比较既无可操作性,也无价值。1978年,宾福德出版了《纽纳米特民族考古学》,重新定义了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在长达10年的对纽纳米特爱斯基摩人社会的民族考古学调查基础之上,该书以几近琐碎的复杂方式讨论了纽纳米特的狩猎、肉食加工和消费的空间和时间特征,提出了工具套、肉食组合和社会性消费等方面一系列中程理论。这是重新界定民族考古学定义的研究^[5]。宾福德的民族考古学超越了以默证方式进行的以今证古、推己及人的民族考古学,开启了中程理论基础之上的类比研究的先河。

宾福德的学术生涯曾经短暂地涉及到中国,但由于范式差异而引起的论争,导致中国考古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不满甚至排斥新考古学。宾福德曾于1985年访华,重点调查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恰在此行前后,他发表了数篇涉及周口店的论文,包括与何传坤合作的《远看埋藏学: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和宾福德夫妇合作的《周口店:近距离观察》^[6-7]。通过对周口店的分析,宾

福德认为当地的燃烧痕迹并不支持人工取火的假设,很多可能是鸟粪自燃的结果;长骨的断裂是自然磨痕或者动物咬痕,而非制造工具所致;文化层中并不存在“炉灶”痕迹;直立人也不是捕食大型动物的猎人,而是食腐人群;周口店可能也不是“北京人之家”。宾福德对周口店的观察显然出自验证关于采集-狩猎群体的出现的假设,类似想法早在《骨骼:古代人类和现代神话》中就已经有所表述。宾福德将周口店看成“系统”,由样本片段提取有效的假设,并验证假设。但是,80年代中期的中国考古学更青睐基于历年积累的田野资料的归纳法则,对宾福德在选取材料样本上的“片面性”指摘尤多。而更深层次的冲突存在于范式差异上:新考古学关注文化过程通则,而80年代中期的中国考古学仍然以完善文化编年为主要目标。种种原因造成了中国考古学与新考古学的交流障碍,也影响了中国学人对新考古学的接受。

如同过去150年中众多前行者一样,宾福德在世界考古学进程上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宾福德目睹了他所倡导的新考古学理念被不同的考古学传统所接纳,问题意识和作业程式转变为学科共识。因此,90年代以来崛起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并不是新考古学的终结者,而是在新考古学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这将成为不断重新“阅读”和“阐释”获取全新洞察的源泉。

- [1] Binford, Lewis.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J]. American Antiquity 28: 217. 1962.
- [2] Binford, Lewis, and Sally Binford.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M]. Chicago: Aldine. 1968: 5-32.
- [3] 崔格尔著. 考古学思想史 [M]. 徐坚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250.
- [4] Gordon Willey and Philip Phillips. Method and Theory in Archae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
- [5] 徐坚. 民族考古学: 定义问题 [J]. 江汉考古, 2009(4): 49-55.
- [6] Lewis Binford and Ho Chuan Kun. Taphonomy at a Distance: Zhoukoudian, “The Cave Home of Beijing Ma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26.4: 413-442. 1985.
- [7] Lewis Binford and Nancy Stone. Zhoukoudian: A Closer Look [J]. Current Anthropology. 27.5: 732-745. 1986.

(责任编辑 张鹏程)